



中山大学中文系编

目 录

鲁迅生平简介·····	(1)
未有天才之前·····	(17)
这个与那个·····	(30)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52)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77)
答有恒先生·····	(89)
文学和出汗·····	(106)
流氓的变迁·····	(115)
习惯与改革·····	(127)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135)
《杀错了人》异议·····	(158)
谈金圣叹·····	(167)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179)
趋时与复古·····	(201)
从“别字”说开去·····	(217)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229)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251)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262)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291)
风波·····	(307)
阿Q正传·····	(325)
祝福·····	(394)
自嘲·····	(428)
无题·····	(432)

鲁迅生平简介

鲁迅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一

鲁迅原名周树人，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城的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他小时候常随母亲到绍兴乡下外婆家，有机会接触农村，接触许多劳动人民的孩子，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知道农民“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使他从小就同情劳动人民。他十三岁那年，祖父因事下狱，接着父亲病重，家庭经济急剧下降，甚至要借债度日。在这衰败途中，鲁迅饱尝了世态炎凉，“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又使他

对本阶级发生了极大的憎恶。

青少年的鲁迅，生活在一个黑暗、混乱、人民痛苦不堪的年代。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经过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等一系列反侵略战争的失败，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国人民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奋起反抗，相继爆发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但在卖国贼、投降派和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下，革命运动被血腥镇压下去。这时，一些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西方寻找真理”，以期有所改良。那时他们看法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而顽固的封建统治阶级却连改良主义的“维新”也不允许，所以倡导“维新”的戊戌变法很快就失败了。

一八九八年，鲁迅十七岁，开始选择人生道路。当时绍兴破落的读书人家的子弟常走的两条路是做幕僚或商人，他鄙视这两条路，不怕社会的“奚落”和“排斥”，“走异路，逃异地”，毅然到南京去求学。先入江南水师学堂，后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南京读书时，他有机会接触工人，了解矿工过着“鬼一般工作着”的非人生活，使他更加同情劳动人民。这时期他开始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阅读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给他影响最大的是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从这部书中，他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汲取它具有辩证因素的发展观，这使他确信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同时“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呐喊》自序）。

一九〇二年，鲁迅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离开祖

国到日本留学。他立誓用自己的满腔热血，献给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到日本不久，就写了这样一首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首诗，成了鲁迅终生的战斗誓言。他最初选择了现代医学，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想把医学作为救国救民的工具，同时“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可是，这种“维新”救国的“好梦”，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者残酷镇压的现实面前破灭了。在仙台学医的第二年，鲁迅偶然在时事电影片上看到一个中国人给俄国军队作侦探，被日本军队捉去砍头，围着看的中国人，他们体格强壮，却精神麻木。这使鲁迅感慨很深，于是又弃医学文，提倡新文艺。（见《〈呐喊〉自序》）从此，鲁迅便以笔杆子作武器，和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迷信改良主义的维新派暴露了不彻底的弱点，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则主张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这批人集中在日本，鼓吹民族和民主革命，同保皇党人康有为、梁启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当时鲁迅站在民主革命派一边，与革命党人交往颇密，并参加了反清的革命团体“光复会”的活动，同时为留日学生所办的杂志撰稿，积极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批判了只学皮毛、照搬西方的洋务派和维新派。他这时所写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章，猛烈抨击保皇的谬论，宣传

爱国主义，主张用反抗精神同旧思想旧势力作不妥协的抗争，使国民从封建专制及其腐朽的“精神文明”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对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起了激励和促进的作用。

一九〇九年八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先后任教于杭州两级师范和绍兴府中学堂，继续和革命党人保持联系。一九一一年爆发了辛亥革命，鲁迅为推翻清朝反动统治感到极为兴奋激动，并出任山会初级师范学校校长，当革命军到来前，他召集学生，组织“武装演说队”上街演讲，宣传革命意义。次年南京政府成立，鲁迅应邀任教育部部员，不久随政府迁往北京。

可是，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篡夺，孙中山所举行的“二次革命”又宣告失败，接着是袁世凯改称帝制（一九一五）和张勋复辟（一九一七），革命不过改换招牌而已，“内骨子是依旧的”，鲁迅因而感到失望。后来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自选集〉序言》）。因此在五四运动之前，他沉默了一个时期，潜心于辑录古书，搜集、研究金石碑帖。

从南京求学到五四运动前夕，其间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鲁迅还没有获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不能理解阶级斗争错综复杂的现象，但他在摸索中国人民解放道路的过程中，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呼嘯前进。

二

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在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大旗，爆发了划时代的五四运

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毛主席指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鼓舞着中国人民，也鼓舞着鲁迅。他清醒地感到，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革命成功了，俄国被压迫的“下等人”获得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从而为世界和中国人民指出了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所以，鲁迅赞颂十月革命为“新世纪的曙光”（《圣武》）。在这曙光的照耀下，他象暴风雨中的海燕，英勇地坚决地投身于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参加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哨阵地《新青年》杂志的编委工作，并为该杂志撰写作品，猛烈地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开火，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

鲁迅是“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参加五四运动的。他把自己的作品称为“遵命文学”（《〈自选集〉自序》），提倡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和白话形式相结合的文化革命，坚决反对“思想照旧”、“换牌不换货”（《渡河与引路》）的倾向，和当时追求形式主义的胡适之流的所谓“白话文学”根本不同。他在五四前夜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猛烈地攻击了中国社会人吃人的封建礼教，揭露了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这是五四反封建文化的第一声春雷，真正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拾”，陆续写了许多小说，后来收集在小说集《呐喊》和《彷徨》里。这些小说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黑暗现实，无情地批判了孔孟之道，真实地描绘了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唤醒人们起来坚持革命，反对倒退。举世闻名的《阿Q正传》，

就是其中的一篇。这一时期他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和其他杂文，象匕首投枪一样，斗争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形形色色的走狗文人，为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在中国的统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九二一年，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出现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革命的深入发展，五四统一战线发生了分化，鲁迅这时还没有找到工人农民这个新的革命力量，一度陷入苦闷彷徨，但他继续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坚持韧性的战斗。在革命实践中鲁迅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认识到反动派的本性是不会变的，主张痛打“落水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是中国人民对敌斗争的十分宝贵的经验。这时期他同五四运动中的右派胡适之流和鼓吹复古的“学衡派”、“甲寅派”，特别是对以陈西滢为代表的宣扬买办洋奴思想的“现代评论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正人君子”们在鲁迅的揭露和打击下，要求“带住”，鲁迅的回答是：“我还能‘带住’”！充分表现了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以及散文诗《野草》，是鲁迅前期战斗业绩的真实而生动的纪录。而《中国小说史略》则是我国学术史上划时代的著作。

鲁迅在这时期还先后在北大、师大、女师大等校任教，接触了广大的青年，热情地关心他们的成长，积极支持他们的革命斗争。

三

鲁迅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并严于解剖自己。他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坚持革命，永远进击！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肆意屠杀捍卫祖国主权的爱国青年。鲁迅悲愤万分，愤怒地指出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血写的事实”，使鲁迅认清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其御用文人互相勾结、血腥镇压革命群众的狰狞面目；对他们的斗争，除了“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之外，别无他路。鲁迅勇敢地起来痛斥反动军阀及其走狗的罪行，他说：“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表示要和反动派血战到底！火热的斗争生活，使鲁迅不断克服思想上的矛盾和苦闷，更加“奋然而前行”。由于鲁迅为遭杀害的革命群众伸张正义，对制造血案的反动派大张挞伐，因而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

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教了几个月书，在那里写了回忆往事的散文《朝花夕拾》。一九二七年一月离开厦门到广州中山大学担任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鲁迅来广州是因为向往革命，希望与创造社的郭沫若等人联合起来，“造成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两地书》）。可是鲁迅到达广州时，创造社的成员相继离去，这一愿望，终于没有实现。这时正当北伐战争，也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

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助长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气焰，一九二六年三月就发生了国民党右派阴谋夺取领导权的“中山舰事件”。鲁迅一到广州，就察觉到作为“革命后方”的“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广东仍然是十年前的广东”（《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三闲集·通信》），
“四·一五”大屠杀完全证明了鲁迅观察的正确。

鲁迅处在革命深入发展而阵营开始分化的关键时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时他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会见过中共两广区委员会书记陈延年同志，后来被国民党屠杀的中大党员学生毕磊经常访问他，送给他党的刊物。鲁迅在党的影响下，提高了觉悟，对党竭诚拥护。那时正是以共产党为中坚的北伐军胜利进军的时候，他恳切地勉励中大师生“坐着工作而永远记着前线”（《集外集拾遗·中山大学开学致语》）。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三天后，广州也发生“四·一五”大屠杀。中山大学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被捕。鲁迅当日冒雨赴校，并召集各系主任紧急会议，设法营救被捕学生，结果无效，于是愤然辞去中大一切职务，表示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强烈抗议。

在白色恐怖中，鲁迅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尽管反动派对他进行监视、钉梢、造谣、污蔑，但鲁迅对于反动派的迫害，却投以极端鄙视的眼光，公开声明：“正人君子这回是可以审问我了：‘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我可以即刻回答：‘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已集·通信》）他多次与友人通信，尖锐地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的血腥罪

行。应邀出外讲演，提醒青年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而已集·读书杂谈》）；在讲魏晋文章时，借古讽今，隐晦曲折地抨击国民党的黑暗反动统治（《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面对着尖锐、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鲁迅认清了反动派的阶级本质及其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痛切地告诫革命人民：“防被欺”（《而已集·小杂感》）。

经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彻底地把他的进化论思想“轰毁”了，促使他完成从革命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转变。他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他这时期所写的《而已集》和《三闲集》的部分作品，清楚地反映了鲁迅思想发展和转变的过程，特别是新发现的佚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说明鲁迅在阶级斗争实践中，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用马列主义来作为观察当时革命形势的工具，通过对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揭示了不能“忘却进击”这一阶级斗争规律，标志着鲁迅的思想已经有了新的飞跃。

四

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鲁迅离开广州，定居上海。

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正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绞杀革命，残酷地进行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鲁迅在反革命“围剿”中，不怕国民党的

迫害，特务的盯梢，叛徒的告密；坚信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革命的激流，领导坚定的左翼作家，同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粉碎了蒋介石反革命的文化“围剿”，“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一九二八年，上海文化界展开了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当时提倡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大都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他们的立场、世界观并没有根本转变，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是“朦胧”的，只是搬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挂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招牌，对鲁迅进行宗派主义的攻击。在这之前，鲁迅在《革命文学》等文里已指出“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正如“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一样。所以鲁迅在《三闲集》里对他们的所谓资产阶级作家一旦把握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写出来的作品就是革命文学的错误理论给予了驳斥，坚决反对他们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似是而非的种种论调，坚持了左翼文艺运动的正确方向。

鲁迅为了弄通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历史唯物论》、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和《论中国革命问题》等。还亲自翻译了几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体会到马克思主义“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致韦素园的信），使他“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三闲集〉序言》）。鲁迅不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武器来打击敌人，而且善于用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他把学习

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比喻为“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通过马列主义的刻苦学习，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以更英勇的姿态，向敌人展开更猛烈的战斗。

当时，上海的进步的文艺界为了团结对敌，于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鲁迅是“左联”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成员之一。在成立大会上，他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为“左联”提出了明确的战斗纲领。国民党反动派为扑灭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动员了一切走狗文人，打着各色旗号，贩卖各种反动的文艺理论，妄图以文化“围剿”来扼杀革命文学。首先跳出来的是“新月派”的买办文人梁实秋，他适应蒋介石反动政权的需要，疯狂鼓吹超阶级的人性论，鲁迅立即写了《文学和出汗》、《“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著名杂文予以回击，彻底揭露了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反动实质，这是我国五四以来较早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重要文献。鲁迅不但在理论上驳倒了“新月派”，而且在政治上充分暴露了他们为反动派和资产阶级效劳的丑恶嘴脸。

继“新月派”之后，又有人鼓吹所谓“民族主义文学”。一个由国民党的法西斯文人范争波、黄震遐等所组成的官方文学集团，企图用“民族主义”的幌子模糊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掩护国民党的卖国政策。鲁迅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写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指出他们所尽的是“宠犬的职分”和“送丧的任务”，彻底剥掉了他们的画皮，使他们不得不宣告破产。

此后，又有胡秋原的“自由人”、苏汶等的“第三种人”的反动文艺理论的出现。他们装扮出超政治、超党派的

虚伪面目，打着争取“文艺自由”的白旗，恶毒攻击左翼文艺运动。鲁迅在《论“第三种人”》和《又论“第三种人”》里，无情地撕下了他们的假面，指出在阶级社会中，并没有超阶级、超政治、不偏不倚的“自由文艺”和“第三种人”文学。“自由人”、“第三种人”后来不是都当了国民党文化检查机关的官员，成为国民党压迫左翼作家的帮凶了么？

鲁迅还批判了林语堂等提倡名为“幽默”实为瓦解人民群众斗志的小品文的“论语派”和其他种种腐朽、没落、反动的文艺倾向。旧中国文坛上的牛鬼蛇神，五花八门的文化毒菌，在鲁迅的笔下，莫不原形毕露，受到致命的打击，《〈伪自由书〉后记》就是一篇启发我们识别反动文人的种种鬼蜮伎俩及其活动规律的好教材。与此同时，自“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变本加厉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国民党却坚持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鲁迅对此作了充分的揭露和抨击。在这之前，他在《流氓的变迁》里，就尖锐地抨击了《水浒》所宣扬的“受招安”，“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路线。以后并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提倡尊孔读经的罪恶阴谋，写了《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讨孔檄文，打碎了孔夫子这块为历代统治者和反动派所利用的“敲门砖”。

面对反文化“围剿”的重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用尽诬蔑、诽谤、监禁和杀戮等手段来对付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艺运动，鲁迅同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曾经受到鲁迅亲切关怀和培养的青年革命作家殷夫、柔石等五人被捕，在狱中惨遭酷刑，以至秘密处死。鲁迅得悉他们牺牲的消息后，在深夜中写下

了这样一首悲愤的诗：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淄衣。

诗中对反动派的血腥屠杀表示了无比的愤怒，对死难烈士寄托了深切的哀思。

一九三三年六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其时盛传鲁迅亦将不免，但是鲁迅为了争取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把生死置之度外，出门不带钥匙，参加送殓，表示对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的强烈抗议和高度蔑视。

反动派在疯狂镇压左翼作家的同时，还颁布了一系列的反动法令，查禁进步书刊，封闭倾向进步的书店，甚至组织特务、流氓，袭击报社和文化团体，妄图一举剿灭革命文化。鲁迅并没有被吓倒，被压服，在马列主义真理的信念和毛主席所领导的反军事“围剿”的胜利鼓舞下，他的战斗方向更加明确，斗志更加昂扬，他的思想、行动、著作更加马克思主义化了。这时他变换各种笔名，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检查，紧密配合当时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努力写作。

鲁迅无限热爱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左联”成立之初，内部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严正指出：“高谈彻底”的‘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号召左翼作家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为工农大众而团结战斗。这对当时的左翼文艺运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可是周扬一伙并没有

接受鲁迅的意见，他们先是把李立三、王明所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搬到文艺战线上来，千方百计地排斥和迫害鲁迅，起到敌人所不能起的作用。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他们又从极“左”转为极右，机会主义面目再一次暴露出来。果然不出鲁迅所料，这伙“左翼”作家很快变成“右翼”作家了。鲁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周扬一伙假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自觉地执行和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九三五年十月，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长征胜利达到陕北，鲁迅怀着极大的喜悦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了贺电，电文中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充分表现了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信赖。

一九三五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加剧对中国的侵略，引起国内政治的变化，抗日呼声响遍全国。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国内抗日的大好形势，在陕北瓦窑堡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批判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周扬一伙一心充当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忠实走卒，疯狂地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根据王明的意图，提出“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的口号，在一九三六年五月背着鲁迅擅自解散“左联”，然后急急忙忙地拼凑右倾投降主义的宗派集团“中国文艺家协会”。鲁迅一眼看穿周扬等“四条汉子”的险恶用心，愤怒地揭露他们擅自解散“左联”的分裂行为，断然拒绝参加他们所拼凑的“文艺家协会”。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鲁迅提出了旗帜鲜明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无产阶级口号，同周扬一伙所鼓吹的“国防文学”的投降主义口号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周扬等不但不改正错误，反而动员同伙和走卒